

主编

宫晓卫

执行主编

李国庆

王振良

藏书家



第20辑

齊魯書社

BIBLIOPHILE



主编 宫晓卫
执行主编 李国庆 王振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书家. 第 20 辑 / 宫晓卫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6.1

ISBN 978-7-5333-3431-4

I. ①藏… II. ①宫… III. ①藏书—文集 IV.
①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6175 号

藏书家 第 20 辑

宫晓卫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21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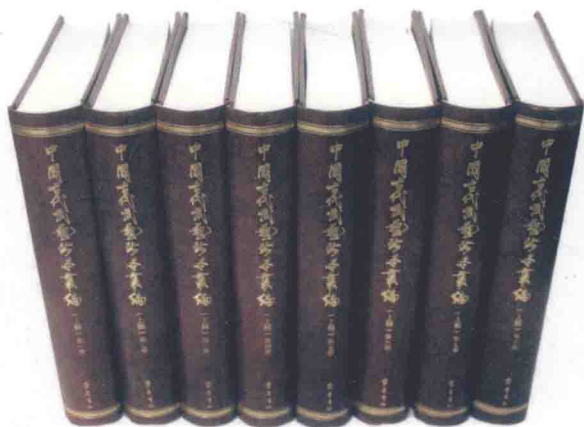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431-4

定 价 28.00 元



新书掠影



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上辑）

马明达 主编

精装16开 8册 2015年2月版

定价：6800.00元

ISBN 978-7-5333-3301-0

《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上辑）》收录了民国以前中国武艺珍本47种，其中多数为世所罕见的稿本和抄本，每种书前都有解题，对每种书的版本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作者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方便实用。本书是对我国古代武术典籍进行系统梳理的重要成果，既有文献整理的参考价值，又有武术文化的保存价值。



孟府档案全编（后集）

官晓卫 侯新建 李 彬 主编

精装16开 86册 2015年4月版 定价：71000.00元

ISBN 978-7-5333-3334-8

《孟府档案全编（后集）》86卷，42000余页，2200余万字，辑录了孟府现存的历史上流寓各地孟氏支派的《孟子世家流寓支谱》270多种，时间跨度从清代道光年间到民国时期近200年，主要涉及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湖北、山西等省，是珍藏于孟府、不为世人所知的唯一一部孟氏支派世系支谱，真实记录了孟子后裔迁徙外地、支派繁衍的情况。



新书掠影



明代四大奇书（1箱8册）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批评
精装16开 2014年12月版 228.00元
ISBN 978-7-5333-3152-8

李卓吾批评《西游记》

【明】吴承恩 著 【清】李卓吾 批评
精装16开 2014年12月版 180.00元
ISBN 978-7-5333-3151-1

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批评
精装16开 2014年12月版 180.00元
ISBN 978-7-5333-3153-5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明】兰陵笑笑生 著 【清】张竹坡 批评
精装16开 2014年12月版 228.00元
ISBN 978-7-5333-3150-4



五里山房珍本丛书（全10册）

周晶 编 精装16开 2015年7月版 定价：6800.00 元
ISBN 978-7-5333-3351-5

《五里山房珍本丛书》，据藏书家周晶先生所藏珍本遴选而成。收录罕见文献 34 种，108 卷，内容涵盖地方志、笔记、诗文集、年谱、音韵之作等。其中多有稿抄本、孤本，如《述异记》《二知轩诗钞》系难觅抄本，《拙斋集》《秋岩诗集》世所仅见。每种书前均冠有周晶先生撰写之题记，全面介绍编撰者、作品内容及版本价值。全书通栏影印，版式疏朗，字清墨浓，印制精良，既便学术之需，又兼收藏之用。

《藏书家》编委会

学术顾问：姜德明 李致忠

主 任：李 培 官晓卫

特约审稿人：周 晶 韦 力 杜泽逊

编 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子善 范景中 龚明德 李际宁 刘玉才

彭震尧 沈 津 时永乐 涂宗涛 王稼句

韦明铤 翁连溪 谢其章 徐 雁 薛 冰

杨成凯 郑伟章

主 编：官晓卫

执行主编：李国庆 王振良

- 开卷新谈 01 谢其章：旧期刊收藏的若干问题（下）
- 藏家点将 11 姚一鸣：知堂藏书小考
- 21 肖伊绯：王国维：密韵楼中老书童
- 天禄寻踪 28 郑伟章：北京文献家新考
- 书海披沙 39 高洪钧：《锦官录》与《解氏家藏》
- 46 王晓娟：清稿本《二知轩诗钞》小考
- 54 李开升：漫谈古书中的“废纸”
- 簿录萃英 59 王 菲、福田文彬：槐影楼阅书记
- 68 张元卿：民国通俗小说过眼录（中）
- 馆藏故事 80 陈东辉：浙江大学的古籍藏书
- 缥緗闲话 87 沈 津：“书中自有颜如玉”——说女子抄书
- 92 杨 琳：新发现的《永乐大典》述略
- 96 林振岳：关于《思适斋书跋》辑本的公案
- 100 张 磊：周叔弢早期译作《人心能力论》

文津茶座	103	曹 鑫：王同愈藏书印考述
	108	鲍国强：文献拍卖应价技法举要
故纸遗闻	113	王晓兵：新发现的王献唐藏书及题跋
	117	姜庆刚：周子美先生书信考释
	120	李 军：来燕榭与松江韩氏藏书的因缘
故老追怀	125	许超杰：书人已逝 墨香永馨——记先师时永乐教授
	133	周 晶：《藏书家》的未了情——追怀杨成凯先生
琅嬛琐录	138	韦 力：寻访藏书家墓地（二）
	149	张金钊：相逢总是缘——张振铎先生与古籍抢救
	153	赵 宣：蜚声卓越在书林 ——版本目录学家江澄波先生印象记
	157	荣方超 张 芳：古旧书商的商务品质及人文内涵 ——以《津门书肆记》中的书贾群像为例
	163	陈 皮：旧书堆里的签名本
	168	蒋颖馨：有关康嗣群的几册签名本
	171	韦 泱：乙未年淘书札记四题
	181	宋 健：我的“藏缘”与“读缘”
	186	编后记

旧期刊收藏的若干问题（下）

谢其章

三、“终刊号”更难寻

保护古旧期刊并将其版本价值提升为与“古籍善本”比肩而立的地位，当然是版本理念转变的一件好事，而如何保护好、利用好古旧期刊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譬如，一种期刊的完整与否（即一种期刊到底出版了多少时间、出版了多少期册的准确数据），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那些比较权威的期刊目录亦未可尽信），仍需要我们不断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实物（原版期刊）和史料线索做一点考证辨析的细活。需要做的事很多，方法手段亦不尽相同，我自己则是把“终刊号”作为一个切入口的，亦略有心得。判断一种期刊的完整与否——“创刊号（创刊号之前有可能还出过试刊号）表示它的起点，终刊号表示它的结束”是最简单的公式。创刊号一目了然，有诸多醒目标志，无须多费周折，而“终刊号”的断定则须“小心求证”下一番功夫，“终刊不终”的例子很可举出一些的。如果不能首先确定一种期刊是否完整，接下来的研究结论必然要打折扣。

上海陈思和教授在《杂志杂谈》一文里说道：“一本杂志的创刊号似乎并无什么可说，倒是它的终刊号更多耐人寻味。”台湾“中央图书馆”研究员张腾蛟先生在《搜集杂志创刊号》里也多次提到“终刊号”的苍凉——“没有一本杂志不希望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的，然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诞生固然喜悦，夭折又是何等的悲哀……著名杂志的创

刊号很珍贵，可是，当得不到它的创刊号时，弄到一本它的结束篇也行。”诞生有一千个理由，死亡也有一千个理由，折射在一本有血有肉的期刊上，我们感悟到的是同一个理由。一百多年来有数不清的期刊庄严而热烈地创刊（读读那些壮怀激烈的“发刊辞”便知），接着，一鸡鸣而一鸡死，数不清的期刊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终止。与创刊时的热闹相比，终刊往往无声无息，甚至“不知所终”——我们往往不能准确地说出一本期刊最后结束的日期。这里先举手边一个刚刚获知的例子——“《女声》月刊，1942年5月15日创刊，至1945年7月15日出至第4卷第2期（总第38期）终刊，前3卷由李俊芝（即日人佐藤俊子）主编，第4卷由关露主编。”这是《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封世辉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女声》的著录，《女声》属上海沦陷时期背景复杂的刊物，按常理，史料卷的著录应是可信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对《女声》的著录也是截止到第4卷第2期（1945年7月15日）为终刊。我自己刚刚入手《女声》第4卷第2期，自以为又新添了一种“终刊号”（近年我把终刊号作为收集专题，并写了《“终刊号”丛话》一书），及翻查了一旧一新两本权威期刊目录，事情却起了变化——第4卷第2期并非《女声》之“终”——《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里《女声》著录到了第5卷第1期（1946年1月）；《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也著录到了第5卷第1期（1946年1月），但有一点令人不十分放心，上海图书馆并未藏有《女声》第5卷第1期实物，它的著录是转录。一般来说，沦陷区所出期刊到了抗战胜利，除了极个别的都停刊了，尤其是那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更是惟恐停之不及，所以说《女声》停在1945年7月15日再正常不过了，怎么会在胜利后的1946年1月又孤零零地出了一期？这一期和前面的《女声》及编辑关露有什么关联？这都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谜团，亦是终刊号的魅力所在。

相似的例子还有一个，上述的两个权威目录都将一本叫《实报半月刊》（1935年10月创刊，北平实报社主办，管翼贤、罗保吾主编）的期刊著录为自1卷1期出至3卷18期，但一个（《联合目录》）将终刊号3卷18期的日期定在1937年7月，另一个（《期刊总目》）将3卷18期的日期定在1938年×月。北平是1937年7月28日沦陷的，在此关口停刊合情合理，所以《联合目录》说1937年7月停刊有它的依据，但是从期数上“挤”，1937年7月只能出到第2卷第19期，我手中保存的第2卷19期正是1937年7月16日出版的，日期对得上，但期数对不上。再说《期刊总目》将停刊日期定在1938年×月，于当时的局势

似乎不符，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北平实报社的政治立场，了解到管翼贤的汉奸背景，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因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期刊总目》的著录，而《联合目录》的“1937年7月”有可能是“1938年7月”之误。正确的著录应该是：《实报半月刊》出至第3卷第18期（1938年7月）后停刊。从这个例子的推理，我们明白，判断一本期刊的终刊应有三个不可少的条件：比较权威的目录，实物（原版期刊），缜密的考证辨析。《期刊总目》为什么不能肯定《实报半月刊》停刊的准确月份，因为它的馆藏《实报半月刊》只藏到第2卷第19期，未存关键的第三卷。

有一条简易判断“终刊号”的方法——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当口，常常造成期刊的停刊。如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北平的“七七事变”，还有抗战胜利、全国解放等等，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着重注意的是那些迈过历史关口继续出版的刊物，看看它们背后隐秘着什么。一本期刊的最终完结，不外乎三个因素：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出刊物，由于政治原因停刊的占很大比例，政治原因说穿了，就是被当局查禁，以至于专门搜求“禁刊”也成为后来研究者的有着浓厚兴趣的课题。现代文学专家阿英、唐弢、倪墨炎、瞿光熙等均在“禁查书刊”课题上撰有专文或专著。在一份《国民党反动派查禁报刊目录（1929—1931）》的资料中，短短两年内竟有三百多种刊物遭到查禁，著名者如《海燕》《拓荒者》《巴尔底山》《萌芽月刊》《大众文艺》《文化斗争》等，解放以后的首批期刊影印重点就是上述这些刊物。查禁的理由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荒谬——如“攻击中央肆意造谣宣传反动”，“挑拨派别意图分化”，“宣传反动煽惑人心内中尤多提倡阶级斗争言论”。不可思议的是“宣传拉丁文，提倡拉丁化文字”也可成为查禁的理由。

政治原因之外造成刊物办不下去的另一个大原因是经济问题，为数众多的期刊难以为继是因为“没钱了”，无法支撑下去。我们仔细阅读当年旧期刊上的“编后记”，常常可以看到主编者大倒苦水，什么“纸张又涨价啦”，“工厂印刷费又涨钱了”，“我们的杂志定价也不得不涨啦”，坚持不下去的只有停刊一条路可走。三个原因之中，由于内部人事矛盾纠纷而造成刊物停办的，最不容易被外人所了解，到底为什么停刊，只有当事人清楚，他不透露别人无从得知。要探寻此类刊物的终刊内幕，必须关注当年主编者的回忆文章，也许多少年之后，秘密才会被揭示。

四、专号与特辑

“专号”或称“特辑”——以某项内容为中心而编成的一期报刊，专门报道、论述、研究某一主题的某期报刊。

前面讲到搜集创刊号、终刊号之类的专项收藏方法，此外值得留意的还有期刊的专号和特辑。所谓专号，即某一期杂志为它的内容设定了一个主题，所有的文章都围绕这个主题来写。譬如“鲁迅逝世悼念专号”，不言而喻，这一期的内容都是悼念鲁迅逝世的。名人的去世，是刊物出专号最多的起因，但是能担起出版专号殊荣的名人极少。我收藏的专号中只有《青年界》的《朱湘纪念号》，《文讯》的《朱自清先生悼念专号》等。有的专号，内容很单薄，只能约到三四篇文章。专号一般都在封面上显眼地写明该期是什么什么专号。

专号的做法，对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很起作用。除了纪念人物的专号，更多的专号是约名家专门谈一个话题，譬如《东方杂志》1933年第一期是《“新年的梦想”专号》，1937年《文学》杂志的第一期是《新诗专号》，都是分量很重的专号。邵洵美主编《论语》杂志时期，特别偏好编专号，如《鬼故事专号》《家的专号》《癖好专号》《灯的专号》，连吃、病、睡这类题材，邵洵美也有办法各出一期专号，《论语》最后一个专号是《逃难专号》。

早期的旧派鸳蝴文艺刊物却是最先使用专号手段来编辑杂志的，他们编专号，不是为了悼念谁，而是很随意地想起个话题就办一期专号。譬如《半月》和《紫罗兰》杂志，就是大出专号的刊物，什么《恋爱专号》《家庭专号》《装饰专号》《消夏号》《歌舞号》《非战号》等等，不一而足，隔个几期就出专号，这样的专号不太具有收集价值。

五、合订本的优缺点

杂志和报纸一样，为了长久保存的缘故，到了一个月或一年，就要合订成册。讲究点的用精装，简陋点的用牛皮纸一裹。不管是私人收藏，还是图书馆藏品，合订本好像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保存方法，尤其是图书馆，借阅的人多，更是非合订不可。还有一种是合订本，是出版杂志的公司自己合订的，这种原装的合订本，尤其值得收集，市面上流传的很少。我买了几种，譬如《现代》《文学》《论语》的原合订本，留有那个时代装订工艺的痕迹，更具有故物的特征。

合订本的优点上面讲过了，就是它的便于保存性。每一种事物都有两面

性，合订本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很多时候这个缺陷会使藏家难决取舍，我过去是合订本的反对派。如果有两种选择，我肯定是选零本而弃合订本，为什么呢？因为合订本势必要将杂志三边切齐，另一边被装订线占有，一张美丽的封面被这么一整，真可谓面目全非了。如果仅是阅读损失还不大，可是从收藏的角度来看，这件藏品就算“残品”了。如果装订技艺再粗糙一些，这样的合订本怎么看怎么别扭。另有一种合订本是装订厂为图省事省料，将封面全去掉了，更是难以容忍。

合订本还有一个缺陷，现在已凸显了。假如你想复印合订本里面的一篇文章，你会发现很困难，总是复印不全，离书根越近的地方越复印不清楚。还有一个苦头，是拍合订本的封面照片（书影）也有困难，勉强拍下来效果也不好。我看过一回中国期刊展，老旧杂志多为合订本，只能像一本摊开的书一样摊在那展出，远不如一本散册杂志展开来让人感到美观。

六、丛刊是期刊吗？

常有书友问，收藏老期刊时，那些标有“某某丛刊”“某某第一辑（集）”的，算不算期刊，能不能当作期刊来收藏。我开始也不懂这些“似书似刊”到底应该算书还是应该算期刊，后来多有留意，方略有领悟。这个问题要分两个阶段来讲，解放前是一回事，解放后是一回事，盖两者的出版发行政策规定大有不同。这里只谈前者。

丛刊往往具有期刊的面目，开本、编排、序言、目录、作者、版权页、封面，都一如期刊，全然不像“书”的样子，可是它为什么称丛刊，丛刊的第一本为什么不称“创刊号”，而叫“第一辑”或“丛刊之一”呢？我是在无意中读了金性尧的《期刊过眼录》后，才找到了解答，金性尧写道：“此外，尚有介乎书籍与杂志之间的丛刊，如上举之《燕京学报》号外是一种，由一人执笔作固定题目。亦有文学性的亚东之《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商务之《星海》，大江书铺之《文学研究》。出版的日期没有确定，执笔也非一人，而略有同人性，文字则较结实，现实色彩比较少，实则与杂志也并无怎样大不同。大家知道在四五年前，凡是新出版的杂志，几乎十之八九采用了丛刊的形式，尤其是比较硬朗泼刺的。这原因不消说是为政治的压力。因这时发行杂志必须向工部局登记，丛刊则择每一期中某一篇作品为刊名，旁注某某丛刊之一，便可以书的方式避免这限制了。不过这样的做法，自然还有问题，例如登记虽然避免，但查禁依然很严。”

金性尧此文写于1944年，说的丛刊大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些话由于当时金性尧身处沦陷的上海，说得有些云里雾里，但大致丛刊是怎么回事他说明白了。

另有一资料与金文所称的时间相差不多。范泉先生创办过几个知名杂志，其中之一乃《文艺春秋丛刊》。范泉后来回忆道：“在沦陷了的上海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避免登记，决定用期刊的形式，丛刊的名称，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范泉将丛刊与期刊的关系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文艺春秋丛刊》共出五辑；分别是《两年》《春雷》《星花》《朝雾》《黎明》，封面是钱君匋设计前三辑，池宁设计后两辑。

这里所说只是关于丛刊的一己之见，在期刊的研究中，丛刊的面目最为模糊不清，就是在图书馆的管理上，丛刊也是个头痛的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图书馆》杂志上有人撰文专门讨论过。

七、老杂志的“初刊本”性质

作家的作品在发表程序上，有个现象颇值一说。作品多先于报刊刊载，然后结集出版单行本。譬如张恨水的小说即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出书。人们重视初版本的收藏，却往往忽视了报刊的“初刊本”性质。这当然与报刊的不易收集有关，可也不能否认藏界对于“初刊本”的学术价值的不够了解。

《骆驼祥子》谁没有读过？但是知道其版本变迁的人恐怕就不很多了，知道《骆驼祥子》被多次动过“手术”的恐怕也不多。有的“手术”只是订正错别字，有的“手术”删去了不大洁净的语言，有的“手术”干脆将全书最后的第24章全部删除，一些自然段的删改也不在少数。新文学版本专家朱金顺教授在《新文学考据举隅》一书中有专文《〈骆驼祥子〉版本初探》，对该书进行了精详的考证。《骆驼祥子》最早就是在《宇宙风》杂志第25期至第48期连载，一期一章，共24章。这是原生态的“祥子”，是以后一切“祥子”的祖本。据现代文学专家丁景唐考证，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骆驼祥子》手稿——“全部书稿24章内容均与《宇宙风》上连载的文字相同。”据此可以说，《宇宙风》第25期至第48期是《骆驼祥子》的“初刊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再举一例。近年来，有关《毛泽东自传》最早版本的“发现”与“惊现”的消息报道屡见报端，好像发现了天外来客，一些大学者也卷了进来跟着惊讶，并且跟着争论何者为最早的《毛泽东自传》，大呼小叫，终于惊动了大

图书馆，开始翻箱倒柜地查家底，原来所谓“惊现”的宝，几十年来一直静悄悄地沉睡在书库的某一角落。我们已然习惯于“守着宝贝找宝贝”。《毛泽东自传》的来历，当年已说得很清楚——“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向美国著名记者史诺氏的口述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原文在《亚西亚》杂志上分四期发表，经本社译出并在《文摘战时旬刊》中连续刊出。”（上海黎明书局发行单行本《毛泽东自传》广告，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自传》最初的出版形式不是单行本，而是期刊，这点已确定无疑，所以最初承载《毛泽东自传》的中文期刊，应该确认有着非同一般的版本价值。我们特别喜欢争执“最早”“最先”，还有比《文摘》更早的《毛泽东自传》吗？

《文摘》杂志，1937年1月1日创刊，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上海黎明书局发行，卢沟桥事变后，更名为《文摘战时旬刊》。《毛泽东自传》在《文摘》第二卷第二期（1937年8月1日）的第379—383页首次露面连载，题名《毛泽东自传（特译稿）》，下注Edgar Snow笔录，吴光译；旁注Asia七月号。第二卷第二期后《文摘》更名，《毛泽东自传》在《文摘战时旬刊》上连载6期完毕。这样，《文摘》第二卷第二期加上《文摘战时旬刊》的6期，共同形成了《毛泽东自传》的最早中文文本，而晚了几个月（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单行本《毛泽东自传》，终归称不上“最早”了。

八、藏刊应讲究专题

中国之有期刊，虽然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出版的期刊数量已达到四五万种。不管多么有实力的藏家也不可能将这么多的杂志一网打尽，图书馆也做不到。所以，现实一点的收藏策略就是专题收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抓住兴趣点就是抓住了专题，集中财力，容易出成果，“兴趣广泛，全无心得”最不可取。

上海有位赵士荟老先生，收集老电影资料六十几年，电影杂志、影星老照片、电影说明书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个电影资料库。赵先生撰著的电影文章，史料性是别的作者比不了的。他还经常上电视台，讲述老电影的逸闻趣事，由于赵先生手握第一手资料，所以讲起来很生动很有说服力。

北京有一位方先生，自住房即可称“中国象棋图书馆”，所藏棋刊数万册，为了保证书刊之安全，方先生冬天家里也不生煤火，来客一律“严禁吸烟”。

我自己有好几个小专题，电影杂志、漫画杂志、文学杂志。还有一个专题

是，凡刊有张爱玲作品的杂志，必收之。

九、集藏期刊目录不可或缺

现在的收藏较之过去那是条件好多了，这条件好的标志之一，就是工具书的唾手可得，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以期刊目录为例，就有《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电影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等正式出版的目录，这还不包括大学、研究机构、旧书店自己编印的期刊目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几部大型期刊目录加入进来，它们之间互有补充，使用起来十分趁手。

目录的使用也需要积累经验，因为我们既离不开目录，也不能完全依赖目录。

我曾买到一册印数很少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珍稀期刊题录（1902—2002）》，印数仅1200册。本书收录了北师大馆藏珍稀期刊280余种，对于每种期刊的著录项目有：（1）题名（包括副题目和并列题名）；（2）编辑者；（3）版本；（4）刊物的出版情况；（5）出版发行地；（6）出版发行者；（7）出版发行年；（8）文献总数和刊物的外部描述（尺寸大小，有无插图等）；（9）主要栏目；（10）统一题名；（11）出版频率；（12）附注（包括刊物的沿革和各项细节）；（13）内容提要；（14）分类，主题；（15）馆藏。这15个项目其实也就是“刊话”写作的要素，虽然不见得每篇“刊话”都要将15个要素都交代全。

于天池教授为本书作序，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纂出版馆藏珍稀期刊的目录在学术的严谨方面承担着一定的风险。虽然图书馆界都承认珍稀期刊的存在，但哪些是珍稀期刊，依据什么标准来划定珍稀期刊，各馆在选择的标准上不尽一致。本题录的依据有二：其一是，依据相关的工具书著录的情况来确定，主要的参照典籍是《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它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中国1833年—1949年期间的期刊志。它明确地著录了各种期刊存世散佚的情况，一般而言，它缺载失录的，或者是虽然著录，但入藏的图书馆非常稀少的，自然应该属于珍稀的范围。前者北师大图书馆藏有十余种，后者也有相当的数量。其二是，根据我们现时在全国比较重要的部属重点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入藏的粗略统计来确定。根据对兄弟馆的期刊入藏情况的了解，又确认了所谓珍稀的第二个依据，即如果这种刊物有较多较大的图书馆没有入藏，我们

就把它也纳入了珍稀的范围。可能后者的纳入标准稍嫌宽泛了些。根据这两种依据,我们确认的珍稀刊物约280余种。”

于教授说了这番话后,仍担心别人对珍稀标准质疑,只好又补充说:“所谓珍稀(只)是一个描绘性的词汇,它相对主观而又有一定的模糊性。有时是否称得起珍稀可能会引起分歧和争议,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而言,之所以编写这本题录,既不想敝帚自珍,也不想夸示炫耀,更没有任何商业的目的,只是为了按照自己的理解揭示馆藏,给利用图书馆期刊的学子们提供一种便利,如果有人以‘快炙背而美芹子’相耻笑,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作为私家收藏的期刊爱好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认定某期刊的珍稀与否,其依据也只能是于教授所说的相关工具书,主要的参照典籍也只能是《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现在又有2004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其权威性似略胜《联合目录》)。资深的老期刊收藏家姜德明、胡从经,通常也是依据《联合目录》来判断某本杂志的“珍稀度”。胡从经说:“一般而言,猎书是围绕着研究课题进行的,例如六十年代就想写《中国文学期刊史》,所聚近现代文学期刊不下千种。其中就有百余种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所未著录。像李叔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在东京创刊的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八十年代中在东京神田町一家旧书店觅到,国内公私藏家均无收藏;又如《声色》,从未有人提到它是新月社的刊物,也不见任何处所有藏。”胡先生所称“国内公私藏家均无收藏”及“也不见任何处所有藏”,都是过头的话,说有易,说无难,“均无收藏”——如何调查得来如此肯定的结论,而且私家收藏如何普查?后一个“任何处所”亦同前病。中国现代文学馆某研究员尝言“《女神》初版本全世界只存有三本”,这位研究员的口气大到“全世界”,更不知他如何操作范围如此大的全球性调查,也不知为了一本《女神》有无必要惊动他国。我曾就此戏言,不知他去莫桑比克调查了没有。

完全依据《联合目录》作为“珍稀与否”的标准,还有一个不准确的地方,如《联合目录》的“编例”中已说明有“几个不收”,不收不等于失收。所以,假如你手中有《联合目录》标明了的“不予收录”的期刊,就该慎重一些,不要急于自作多情地视为珍稀之物来夸示炫耀。《联合目录》收录的期刊仅19115种,离1833—1949年间实际刊行的三四万种相去甚远。

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出版《中文期刊大辞典》,“前言”称“但《联合目录》已出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有许多遗漏。《中文期刊大辞典》的编辑出版,为我国增添了一份反映中文期刊全貌的重要资料,为广大读者和